

群众出版社

希特勒的末日

(英) 特莱弗·罗珀 著

龚新康 孙宇 译



希特勒的末日

〔英〕 特莱弗·罗珀 著
龚新康 孙宇 译

群众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北京

希特勒的末日

(英) 特莱弗·罗珀 著 龚新康 孙宇 译

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京安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9印张 190千字

1985年4月第1版 1985年4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3067·243 定价：1.35元

印数：000001——90000册

说 明

本书作者特莱弗·罗珀系当代西方颇有声望的历史学家，堪称研究希特勒问题的权威，战时曾任英国情报官，二次大战结束后不久受命调查希特勒的末日情况，后任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纳粹德国战犯的审判官。本书就是根据当时的大量第一手调查材料和审讯材料写作而成的。书中较为客观地剖析了希特勒以及纳粹德国主要战犯戈培尔、戈林、希姆莱、施佩尔和博尔曼等人，对第三帝国最后十日的情况也作了具体的介绍，材料翔实，分析较细，有一定的说服力。

本书初版至今已近四十年，其内容被不少历史学家广为引用。《第三帝国的兴亡》一书作者威廉·夏伊勒曾说：“所有写第三帝国历史最后一章的人都从该书得到了帮助。”

本书导言对最初的调查作了详细的补充说明，同时着重介绍了一九五六年从苏联获释返回西德的前纳粹战犯提供的新材料。这些材料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重视。

本书在翻译时对某些内容作了必要的删节，但问题还存在不少，望读者在阅读时注意分析鉴别。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译文中一定有不少错误和不妥之处，望专家、读者批评斧正。

本书是据西德乌尔斯泰因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德文版译出。

译 者

目 录

导 言	(1)
第一章 希特勒及其宫廷	(45)
第二章 失败的希特勒	(86)
第三章 失败的宫廷	(115)
第四章 危机和抉择	
四月二十日——二十四日	(144)
第五章 包围地下堡垒	
四月二十五日——二十八日	(179)
第六章 “布鲁图，你也是……”	(197)
第七章 希特勒之死	(227)
结束语	(259)
材料来源说明	(271)
附录 处决菲格莱因	(278)

导 言

本书脱稿已十载有余。期间，有关上次世界大战的很多不解之谜，某些已经解开，某些则越发神秘。那些在一九四五年时无以寻觅的目击者们，在长期当了俄国战俘后，终于又重新露面了。他们撰文著书，对以前的某些结论提出了质疑或修正。但迄今为止，似乎仍无任何新的材料可以改动这本写于一九四五年、发表于一九四七年的关于希特勒最后十天情况的史书。因此，本书再版时除需纠正某些司空见惯的印刷错误外，我没有任何理由可对本书作内容上的修改。当然，我会对某些章节作些补充，但不存在任何根本性的错误要加以排除，也无漏洞需要弥补。因此，我要说的正象本丢·彼拉多^①所说过的那样：我写的是我所写过的东西。我认为，任何值得再版的书，都不必掩饰它的初版面目。因此，凡是我认为需要对本书作补充的地方，我只采用加脚注和写导言的办法。细心的读者可以看出，有的注解我特意注明了“一九五六年”的字样。

我写这篇新导言有两个目的：一、我将详细介绍我为撰写本书所作的原始调查情况，它与本书一九五〇年第二版的介绍基本一致；二、我将概要介绍自那以后出现的新材料，

^① 本丢·彼拉多，公元一世纪（约26—约36）罗马帝国驻犹太的总督。据《新约全书》记载，耶稣由他判决钉死在十字架上。——译注

它们虽未触及本书内容，但对理解某些问题，特别是理解俄国对希特勒末日情况所发表的言论，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在一九四五年五月至九月期间，关于希特勒的生死问题众说纷纭。有的说，他已在柏林之战中被击毙；有的说，他已在动物园被某些军官处决；另有人猜测，他已乘飞机或潜艇逃亡，据说还活着，也许在他的阿尔巴尼亚匪徒朋友那里，要不就在波罗的海的某个迷雾笼罩的岛上，也许在莱茵兰的某个岩石堡垒里，要不就在西班牙的某座教堂内，还可能在南美洲的某个牧场中。其实，最能说明事实真相的首先应是俄国人，然而他们却守口如瓶，甚至故意混淆视听。他们先是宣布希特勒已死，接着又说自己的声明有出入，其后又宣称，他们找到了希特勒和埃娃·布劳恩的尸体，并根据他们的牙齿得到了核实。不久，他们又责怪英国人把埃娃·布劳恩（可能还有希特勒）隐藏在了德国的英占区内。鉴于这种情况，英国驻德情报机构决心收集一切可能得到的证明材料，并要相机揭示事实真相。英国人认为，迄今为止的各种假象只会引起不必要的思想混乱。于是我被指定去完成这项任务。英占区当局向我提供了各种必要的方便，设在法兰克福的美占区当局也立即慷慨地表示，我可以使用他们所占据的全部档案材料，还可以提审俘虏。他们的地方谍报机构也将协助我工作。

当时的调查结果究竟如何呢？宣布希特勒已死的主要根据可能是海军上将邓尼茨于一九四五年五月一日晚向德国人民发表的广播讲话。邓尼茨在讲话中宣称，希特勒在柏林领兵作战，已于当日下午阵亡。当时，人们都信以为真。《泰

晤士报》次日刊登了唁电；爱尔兰总理德瓦莱拉在都柏林向德国使节表示了哀悼。于是有人认为，希特勒的名字应从纽伦堡受审战犯的名单上勾去（博尔曼则不同，关于他的下落当时还没有类似的消息）。另一方面，当时也无人说邓尼茨的声明比其他各种说法更为可靠。邓尼茨的说法首先得到了斯图加特某个叫卡尔·海因茨·施佩特的医生的支持。施佩特在巴伐利亚州的依勒蒂森度假时发誓说，希特勒于五月一日下午在动物园堡垒旁被俄国人的炸弹炸伤肺部，后由他亲自治理。他还说，希特勒后来死了。但是另一证人——瑞士女记者卡门·莫里——却在汉堡同样发誓说，希特勒还活着。她极有把握地声称，希特勒和埃娃·布劳恩、她的妹妹格雷特及其丈夫赫尔曼·菲格莱因都在巴伐利亚的某个农场内。卡门·莫里表示，只要向她提供各种方便，她愿亲自前去调查（她曾在德国的某个集中营内当过奸细，因此知道一些情况）。此外，她还提醒英国当局：没有她卡门·莫里的帮助，任何尝试都会产生严重后果，因为上述四人如果见到穿制服的人前去调查必定会自杀。施佩特和莫里都起过誓，但二者的说法不可能都正确。因此，在希特勒是死是活的问题上，他们的说法均不能作为证词而加以接受。

任何调查人员都会认识到这样一个重要的道理：只建筑在证人供词基础上的证明材料是毫无价值的。到当时为止，这段历史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依据诸如邓尼茨、施佩特和卡门·莫里的所谓证词而写的，搞清楚这个问题可以清醒历史学家的头脑。如果把类似的供词放到一八二五年亚历山大一世的有争议的死亡事件上，那么很多历史学家也许会立即欣然接受的。幸运的是，此案完全可以依靠同时代的人搞个水

落石出。

英国历史学家詹姆斯·斯皮丁曾经说过，针对有关某段历史的证词，任何历史学家都必须首先问问自己：这是谁先说的？他具有了解有关情况的何种条件？如果人们对这些证词进行调查核实的话，那么有关这段历史的证明材料的正确性就会在调查过程中自行得到证实。我在寻访卡尔·海因茨·施佩特医生的过程中，曾查对过他所提供的他在斯图加特的地址。调查结果表明，这并不是私人住家的地址，而是技术大学的校址，当地无人知晓他的姓名，斯图加特的所有地址簿内也都查无此人。显然，他提供的姓名和地址都是假的。如果说他发誓作出的声明在这一点上是骗人的，那么我们也就不可能有任何理由可以认为，这一声明的其他各点是可信的。在上述问题上如果他说不了解情况，那倒还说的过去。卡门·莫里提供的全部情况纯属凭空捏造。她从未见过希特勒，也根本未同任何可能知情的人谈过话。她提供的材料显而易见是错误的，因而根据这些材料所得出的结论同样也是不符合逻辑的。她的全部证词如同施佩特医生的证词一样，完全是个人的想象。

他们为什么在发誓的情况下作伪证呢？人们很难确切地解释他们的动机，但有时也能猜出几分。卡门·莫里在德国的集中营内当过盖世太保的奸细，也从她的狱友中选择过屠杀和试验的对象。盟军知道这些事实，所以当她们占领集中营后，卡门·莫里因其罪行而会受到指控的事只是个时间问题。但是她也许这样想，自己先编造情节，然后说服别人把核实这些情节的任务委托她去完成。她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延缓对她的报应，甚至还可获得英方对她的支持。如果事实

果真如此的话，那么她打错了算盘，因为别人并不需要她的帮助。军事法庭不久就判处了她死刑。卡门·莫里在执刑前自杀了。

施佩特医生的动机似乎更缺乏理智。他编造故事的根据是一清二楚的。他对邓尼茨发表的广播讲话加以扩展，补充以具体细节，并在该故事中也为自己设计了一个角色。邓尼茨说，希特勒于五月一日下午在领兵作战中阵亡。施佩特接过这一可能是事实的说法，然后加上地点色彩和具体细节进行修饰，并且把自己作为中心人物放在这一事件之中。他的动机可能不合情理，但他有一种心理上的原因，即一种由虚荣心引起的狂想，这种狂想促使这位轶事讲述人让自己出现在由他讲述的故事之中。这要感谢乔治四世这位楷模，因为他硬说在滑铁卢战役中是他亲自发动了一场骑兵袭击。

嗜好杜撰传奇故事是人类的（也许特别是德国人的）十个极为典型的特点。人们企图以此来表示他们热爱真理——这种论断看来是正确的，自从我接触上述事件以来，它已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证实。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一个自称为鲍姆加特的德国飞行员在华沙甚至作证说，他于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八日用飞机把希特勒和埃娃·布劳恩送到了丹麦。这完全是无中生有。我在对希特勒的两名座机驾驶员——一名是党卫队副总指挥汉斯·鲍尔，另一名是党卫队旗队长贝茨——进行调查之初，就已查实这两人是在五月一日夜间和博尔曼一起离开地下堡垒的。后来有人在魏登坦桥上曾经见过贝茨。此后，他的妻子和朋友再也没有听到过他的消息。鲍尔后被俄国人俘获，其妻给我看过鲍尔于一九四五年五月自波兰写往巴伐利亚的信件。除此之外，我们还掌握有希特

勒在其遗嘱和结婚证书上的亲笔签字。这两个文件上写着：“柏林，四月二十九日”。这一日期比鲍姆加特所说的用飞机将他送往丹麦的日子晚了一天。与顽固地相信无稽之谈相比，理智确实是无力的。尽管鲍姆加特后来被送进了波兰的一家精神病医院，可是那些很乐意相信他的人仍然毫不怀疑地认为，他的说法是正确的。

诚然，任何传说都不是随意虚构的，某些传说是基于某些事实，或至少是基于某种愿望，只是虚构的程度有所不同而已。我们举舍伦贝格在瑞典被捕后所传播的故事为例，那些容易轻信的人很愿意接受这一故事。舍伦贝格说，希姆莱毒死了希特勒。然而，舍伦贝格是从何而知这些情况的呢？他从一九四二年以后再也没有见过希特勒，他的“证词”完全是根据自己的愿望想象而成的。他顽固地认为，希姆莱确实会这样做的。他对希姆莱的讲话加以断章取义，于是导致了这一明显错误的说法。在对舍伦贝格提了一些问题、在希姆莱的随从人员进行查证以及在研究了伯纳多特伯爵当时的情况介绍后，舍伦贝格的言论被证实与施佩特和莫里的说法一样地毫无参考价值。

于是，在对证明材料进行深入研究的过程中，问题逐渐集中到邓尼茨的广播讲话上来。但是邓尼茨又是在何种场合，下得知有关事实的呢？邓尼茨于四月二十一日离开柏林，此后未曾见到过希特勒，这是一清二楚的。那个广播讲话是他在普洛恩所作的，而普洛恩离他所说的事件发生地（柏林）约一百五十公里，他究竟是如何获知这些情况的呢？这一问题的答案不难找到。“弗伦斯堡政府”成员被捕时，所有文件都被缴获，人们从中发现了一批来往于邓尼茨和希特勒大

本营之间的电报。从时间上看，最后一份文件是戈培尔于五月一日发给邓尼茨的电报^①，其中包括这样一句话：希特勒已于“昨天”（即四月三十日十五时三十分）去世。邓尼茨没有其他证明材料，因为最后和希特勒在一起的人中无一人能到达他那里。从柏林地下堡垒到达他处的只有里特尔·冯·格赖姆和汉娜·赖奇两人，而他们在总崩溃的前两天就已离开了地下堡垒。邓尼茨的说法，即希特勒是在领兵作战时阵亡的，纯属杜撰。向他提供的唯一情况（希特勒死于四月三十日）也和他的希特勒死于五月一日的声明不符。也就是说，邓尼茨同施佩特、莫里以及那些富于幻想的记者们一样，都是毫无价值的、应予拒绝的证人。唯一能证明希特勒死亡的材料是那份由戈培尔签署的电报。但是由于戈培尔已死（俄国人当时找到的正是他的，而不是希特勒的尸体），所以不可能再对他进行审讯了。

当然，证明材料至少还有一个。一九四五年六月九日，苏军司令朱可夫元帅向新闻界宣布，希特勒在其死亡或失踪前已与埃娃·布劳恩结婚。朱可夫说，这一出乎意料的情况（迄今为止，有关埃娃·布劳恩的情况即使在德国也无所传闻）是俄国人在地下堡垒中发现了副官们的日记后才知道的。如果说这些日记确实存在，那么无疑还可以找到其他重要的证明材料。因此，我准备请俄国人向我开放这些日记。但我决定首先收集在英美占区中发现的证明材料，然后愿它们来引诱俄国人拿出这些日记和所有可能由他们占据的其他材料。再则，如果英美占区的那些自愿的情报提供者中没有

^① 电报全文见本书第242页。

一人能经得起审查的话，那么在俄军占领之前希特勒堡垒中的事件目击者必定是其他人，这些人可能在俄占区内。

某些事实现在已可完全肯定。在被盟军逮捕的人中，有几名曾一直同希特勒一起待到大约四月二十二日，其中有邓巴茨、凯特尔、约德尔、施佩尔和其他一些次要人物。因此，在这一时间之前的情况业已查清。四月二十二日，希特勒召开了那次著名的元首军事会议。会上他终于决定放弃权力。会后他命令总部人员撤离，同时强调他要留在柏林。从四月二十二日到五月二日，即俄国人攻克帝国总理府的这段时间的情况，仍然疑问重重。虽然必定会有人能证明这段时间内所发生的情况，但到目前为止这样的证人还未出现。他们究竟是谁呢？当时的任务就是要找到这些人。

要回答这样的问题和完成这样的任务，从根本上说是困难的。曾经留在希特勒身边的是他的几个随从，他们早在四月二十二日之前就已在希特勒身边，并一天也没有离开过他。他们是将军和政客、政府官员和副官、秘书、警卫和士兵。通常在总理府希特勒身边的人的名单是不难列出的，但是我们首先必须找到那些在四月二十二日离开总理府的人，其中大部分已在弗伦斯堡或贝希特斯加登被俘，只有问他们才能知道有谁留在了柏林。此外，我们还必须寻找社会各阶层的代表，因为士兵和女速记员同政客和将军一样，都是有用的证人。所以我要从向我开放的盟军战俘营中寻找尽可能多的证人，不管他们属于什么阶层。不久，我取得了成绩。在弗伦斯堡被捕的人中就有政客和将军，如凯特尔、约德尔、邓尼茨和施佩尔等。于四月二十二日逃跑的两名希特勒的女秘书——沃尔夫小姐和施罗德小姐——是在贝希特斯加登找

到的。希特勒的卫队（国家保安总局一局）中约有一半人于四月二十二日撤退到贝希特斯加登，后在那里被捕。我在路德维希堡和加米施—帕滕基兴的俘虏营中对他们进行了审讯。希特勒的党卫队元首外出卫队曾留在柏林，但其中有一名军官（党卫队上尉博恩霍尔特）在四月二十二日带着特别使命离开柏林，后未返回，估计被盟军俘获。这对我来说倒是一个机会，我可以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邦的新明斯特市向他打听其同伙的下落。这样，我就可以找到希特勒堡垒内的各种身分的证人，他们是在四月二十二日或在此之前离开希特勒的。通过审讯，我们能从他们那里了解到柏林留守人员的情况。我们根据他们的供词列出了一份在四月二十二日的这首大终曲后仍然留在柏林的各级人员的详细名单。他们可能是迄今为止未得以澄清的那段历史的证人（前提是能找到他们的话）。

但是到什么地方去找他们呢？这一问题比想象的要简单。所有这些人似乎都“失踪”了，但是他们不可能逃避现实，也不可能永久隐居不出。他们要么活着，要么死了，二者必居其一，第三种可能性是不存在的。“失踪”这个词与这些人无缘，而只能说明他们还在等。死人已不能成为证人，活着的人要么已被俘，要么还是自由人。如他们已被俘，且被西方国家所俘的话，那么我们定能在俘虏营中找到他们；如他们还是自由人，那么我们必须另想法子找到他们。他们很可能隐居在自己的故乡，因为他们一方面了解那里的环境，另一方面还有自己的朋友，这些是他们得以幸存的良好条件。当然，他们也可能被仇人所出卖（在德国这种事是特别令人憎恨的）。因此，我在收集证人的姓名时特

别注重获得有关他们出生地的任何情况。如果盟军俘虏营名册中没有这些人的名字，那么我就到有关人的老家去寻找，有时也能找到。到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一日，也就是我发表调查报告的日子为止，我为澄清这段历史从各种相互无关的人中找到了七名证人，向他们进行了调查，同时也发现了一些新的重要材料，并对这些材料进行了汇总。这七名证人是：国家保安局一处警官赫尔曼·卡瑙、警官埃里希·曼斯费尔德和希尔科·波朋、博尔曼的秘书埃尔泽·克吕格尔小姐、希特勒的交通官埃里希·肯普卡、女试飞员汉娜·赖奇和男爵夫人冯·瓦罗。赫尔曼·卡瑙是在尼恩堡被捕的，在我对他审讯之前他已被加拿大和英国当局审讯过。埃里希·曼斯费尔德和希尔科·波朋分别是在不莱梅和法林博斯特尔被捕的。埃尔泽·克吕格尔是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被捕的，我审讯过她。埃里希·肯普卡是在贝希特斯加登被捕的，美军人员和我都在莫斯堡审讯过他。在奥地利被捕的汉娜·赖奇被美军方面审讯过。冯·瓦罗男爵夫人是在柏林被一名英国记者发现的。她曾见过希特勒，后来我在布克堡她母亲家里找到了她，并向她进行了调查。期间发表的科勒尔将军的日记^①在弗伦斯堡逮捕施威林·冯·克罗西克伯爵时所缴获的日记，以及海军上将邓尼茨及其“政府”的材料也被证明是重要材料。我依据上述证明材料所写的报告由驻柏林情报部分发给了英国政府和柏林四国调查委员会。我在这份报告的最后注明了有参考价值的其他证明材料的出处。具体地说，我点了负责安排希特勒葬礼的汉斯·鲍尔（希特勒的

^① 卡尔·科勒尔：《最后一月》，曼海姆1949年版。

座机驾驶员)和国家保安局局长拉滕胡贝尔少将(据俄国官方公报称,他现在俄国人的监禁之中)的名。此外,我请求俄国人向我公开被捕副官的日记,朱可夫元帅曾把这些日记作为希特勒和埃娃·布劳恩结婚的证明材料。俄国人虽然表面上接受了我的要求,但此后就如石沉大海般毫无消息了。

期间,我又向新闻界发表了调查报告的缩写本^①。

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一日报告发表到一九四六年夏季本书脱稿的这段时间内,有关希特勒末日情况的证明材料大量涌现。它们除两处无关紧要的细节^②与本书略有出入外,其他都没有影响我的观点。下面我要谈谈几个由于本书出版而引起的问题。

必须承认,对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一日的报告并不是所有人都持赞同意见的,原因也不在于该报告中可能存在某些逻辑性错误或含糊不清之处。一九四五年夏秋期间,一些精明的记者不辞劳苦、饶有兴味地注视着有关希特勒这个怪物的情况。瑞士边界风景优美的湖泊,阿尔卑斯山区情调浪漫的蒂洛尔山村和奥地利北部的疗养胜地,都留下了这些过于热心的侦探的足迹。他们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期间,也有人提出过一些高见,但是直到冬天来临,旅游季节过去后大家

^① 全文见威廉·夏依勒的《柏林日记的结尾》一书,纽约1947年版。美报纸于1945年11月2日摘要刊登了这份报告。

^② 在1945年11月1日的报告中,我由于缺乏足够的证明材料而把举行婚礼的时间说成是4月29日晚上。后来有人证明,婚礼事实上是在4月29日清晨举行的。在该报告中,我还接受了格哈德的说法。他说,他“约在4月28日或24日去过地下堡垒”。我查阅了其他材料后认为这种说法有问题。于是我再次审讯了格哈德,结果表明,他去地下堡垒的时间是4月22日,与我书中所写的时间是一致的。

的观点才渐趋一致：希特勒确实留在柏林。他的命运之谜似乎不必在严冬季节通过旅行，而可以在舒适的酒吧或温度宜人的高级旅馆里通过天才的想象就可揭开。因此，我的报告（我在报告中同意戈培尔电报上的说法，即希特勒于四月三十日死于柏林，而其他解释都与这份“唯一可取的”证明材料不符，因为它们毫无根据）在很多人看来是不可接受的。评论家们虽然不否定我所列的证据，但他们说，避免作出这种结论的可能性始终是存在的。他们还说，被焚烧的并不是希特勒的尸体，而是在最后一刻被拉来当“替身”的人的尸体。如果说他们连汉基教授的类似结论也不信的话，那么他们的态度倒是符合他们自己的言论的：“假如某件事情在总体和特殊方面十分之九是正确的，只有十分之一不清楚，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采取既不否定这十分之九，也不坚持搞清楚那十分之一的态度，那么我们就不是由血和肉组成的真正的人。”他们还喋喋不休地说：所有证人（本书就是根据这些人的证词写成的）都是精心组织的，他们的证词前后一致，无一漏洞，这显然是合谋杜撰的历史，因此必须加以全盘否定；材料的不足给杜撰家们提供了制造各种证据的足够余地，这是值得他们庆幸的。

依我看，上述观点不难驳斥。我们假设一个或几个人被指定在审讯中叙述某一情节，根据逻辑推理，如果他们有正常的记忆和坚定的意志的话，那么估计他们以后也一定会坚持自己以往的说法（即使某些次要的情节会有出入），这里指的是商定的问题。但是一旦问题涉及到未被商定的细节时，他们的供词就必然会牛头不对马嘴，他们的回答就不可能再出自一个共同的、事先精心策划好的方案，而会根据自